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

上海政商互动研究

(1927—1937)

白华山著



SHANGHAIZHENGSHANG
HUDONGYANJIU
(1927—1937)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

上海政商互动研究

(1927—1937)

白华山著



SHANGHAIZHENGSHANG
HUDONGYANJIU
(1927—1937)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政商互动研究:1927~1937/白华山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6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

ISBN 978-7-5326-2813-1

I. 上... II. 白... III. 社会生活—史料—上海市—1927~1937 IV. 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32060号

责任编辑 关春巧

封面设计 姜明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

上海政商互动研究(1927—1937)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8 插页 2 字数 205 000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6-2813-1/K·609

定价:36.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21—62431119

教育部第五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4年重大项目（批准号：04JJZDH007）研究成果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研究成果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资助项目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编纂委员会

主任

熊月之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军 马学强 宋钻友 张 剑

张晓敏 陈祖恩 金大陆 周 武

承 载 钱 杭 唐克敏 彭卫国

熊月之 潘 涛

总 序

熊月之

在古今中外城市史上,没有一个城市像近代上海那么内蕴丰富,情况复杂。这里有三类市政机关,三个司法体系,四种司法机构(领事法庭、领事公堂、会审公廨与中国法庭),三个警察系统,三个公交系统,三个供水系统,三个供电系统,电压有两种(法租界是 115 伏,公共租界是 220 伏),有轨电车的路轨宽度也分两种。

假如有人想从南京路乘电车去中国城里的某个地方,他必须先乘英国电车到租界边的爱德华七世大街(今延安东路),接着穿过马路进入法租界,乘法国电车到南头,然后穿过民国路,再乘中国电车继续前行。在这趟半个多小时的路途上,首先可看到的是穿着英国警察制服的英国人、白俄人和印度锡克族人,然后是穿着法国警察制服的法国人、白俄人和越南人,最后是中国警察。[1]

这里人口多元。域内人口八成以上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湖南、山东等 18 个省区。同乡会是他们最熟悉的组织,同乡是他们最亲切的关系,名目繁多的会馆、公所,为同乡寻

找工作、排解纠纷、申诉冤屈、子女就学、看病就医、办理婚丧嫁娶之事,发挥重要作用。千姿百态的地方话、地方菜、地方戏,成为各路同乡认同的重要标志。外侨人口最多时超过15万,所属国籍与民族最多时超过60个,各种总会是他们最重要的社交场所,日本人则自成社区,将虹口地区建成了“小东京”。

这里货币多元。几乎所有重要的列强都有银行在上海发行过货币,确切可计的有18家。它们发行的各种面值、各种文字、各种颜色、各种图案的纸币,英国女王头像、孙中山头像、自由女神像、赵公元帅像等,同时出现在上海货币市场上,光怪陆离,莫此为甚。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城市,哪怕是伦敦、纽约那样的国际性金融中心城市,能够像这里有那么多品种的货币流通。

这里教育多元。除了国人官办或民办的学校之外,有教会办的,租界工部局、公董局办的,外侨团体办的,有在美国注册、用英语教学、英语考试的,如圣约翰大学,也有用法语、俄语、德语、日语教学的,学制、教员、教科书、教学方法、毕业文凭五花八门。

这里宗教多元。门类之多,教务之盛,信徒之众,均为全国其他城市所罕见。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之外,还有犹太教、东正教、袄教、锡克教、理教。这些信仰系统来源各异、形成历史长短不一、信奉对象千差万别、教堂样式千姿百态、礼拜仪式形形色色、节日庆典斑驳陆离的宗教,如果散布在世界各地,每个地方都自成一一道风景线,一旦汇集到一个城市,那就是众神毕至、群仙咸集、各显神通、各呈异彩的名副其实的宗教博览会。不难想象,近百年间的上海,这里是佛教的水陆法会、春节烧香、除夕撞钟、元宵彩灯、观音诞辰、龙华庙会、浴佛盛典、盂兰盆会;那里是道教的画符念咒、掐诀步罡、祈晴祷雨、驱鬼逐妖、占卜堪舆、超度亡灵,各路神仙从元始天尊、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九天玄女、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

到铁拐李、吕洞宾、关公、钟馗、春申君、黄道婆、施相公、秦裕伯、陈化成，一路走来。一会儿是伊斯兰教的六大信仰、五大功修、开斋节、宰牲节；一会儿是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的圣诞节、复活节、受难节、感恩节、圣餐礼拜、结婚礼拜、追思礼拜、安葬礼拜；一会儿又是犹太教的逾越节、五旬节、住棚节、普林节、修殿节、除酵节。这边是留蓄长发、上衣至膝、戴锡佩剑的“红头阿三”锡克教徒；那边是头戴白帽、身穿白衫的“白衣秀士”袄教信徒；再那边则是壁挂葫芦椰瓢、戒烟戒酒、大摆素斋的理教信众。

人口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必然带来节假日多元、风俗多元。一些多民族人混处的机关、团体、学校，为了照顾各自的宗教信仰，放假的节日就特别多。比如，圣约翰大学就中西节日兼顾，在春节、端午、中秋节要放假，在受难节、复活节、升天节、感恩节、圣诞节也要放假。

至于语言多元、报刊多元、饮食多元、服饰多元、建筑样式多元、娱乐方式多元，早已为人们所习知，毋庸赘言。

这么多的“多元”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近代上海处于中外两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处于多种文化影响的复合区域。

这里处于中国权力控制的边缘地带。租界虽是中国土地，但受治外法权保护，中国地方政府不仅不能管辖作为上海城市主体的租界里的外国人，连对租界里的华人也没有充分的管辖权，不能随意征税，不能随意拘捕，不能随意审判。

这里也处于英、美、法等国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公共租界虽然在大部分时间里权力主要控制在英国人手里，但是，它不等于香港或新加坡，工部局总董不等于香港总督。工部局总董由租界有关居民选举产生，并不需要向英国政府或英国驻沪领事负责，也不一定总要听从英国领事的意见。法租界的情况有别于公共租界，但法租界与法

国政府的关系并不是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

这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如果仅出现在一个租界与华界之间,那还比较简单,而出现在两个租界并存、三个政权同在的情况下,就更为特殊,对于英、法、中等权力控制系统来说,也更为边缘。俗话说:“天高皇帝远”,上海租界距离英、法、中国权力控制中心都特别遥远。

这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如果出现在政治体制相近、司法理念相近、价值观念相同的情况下,那还比较简单,其间的差异会较多地体现利益的不同、立场的不同。但事实是,英华、法华之间在政治体制、司法理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方面既大异其趣,英法之间又曾为宿敌,在政治体制、司法理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方面也有很大差异。这样,在华界与公共租界、华界与法租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间,事实上存在三道行政控制的缝隙,整个上海便成为全世界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异质文化交织的特有区域。

近代上海城市的这种复杂性,复杂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以至于后来的研究者对其作任何简单的概括、断语都是一种冒险,都可能失之偏颇。你可以说它是黑色的染缸,我可以说它是红色的摇篮;你可以说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我可以说它是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本营;你可以说它摩登,我可以说它传统;你可以列出一百条理由说它是罪恶之渊藪,我也可以列出一百条理由说它是文明之窗口。红与黑、善与恶、美与丑、进步与反动、世界性与地方性……几乎任何两极对立的判断,对上海来说都能成立。只有一种判断不会招致反驳,这就是:极其复杂。

近代上海城市的这种复杂性,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这首先表现在它的文化交流功能。近代上海很像一个袖珍地球,全世界不同民族文化,英、美、德、法、俄、日、犹太、印度……全中

国不同地域文化,南起香山、潮州,北到齐鲁、幽燕,东起江浙,西迄川湘,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民俗,都到这里来一展风采,互相交流、融合。说它像一个袖珍地球,而不是世界文化博览会,因为很多外侨是这里的居民,而不是过客。居民与过客不同,居民有长久性,有认同感,长期居住在上海的英美人自称 Shanghailander,直译就是上海人,过客则呈临时性,无认同感。因为是居民,所以,他们引进电灯、电话、自来水、抽水马桶,首先是自己欣赏,满足自用,而不是为了炫耀、兜售。其结果也有宣传作用,但这种宣传不是灌输式宣传,而是示范式宣传。灌输式宣传是我说你听,俯视式的,示范式宣传则是我做你看,平视式的,后者更能让受众心悦诚服,自觉接受。

这也表现在它的唯一性。放眼世界,盱衡古今,从古希腊到新大陆,从亚细亚到欧罗巴,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成千上万,有哪个城市会如此复杂?绝对没有。纽约、洛杉矶、巴黎等,也都是多民族移民城市,也都是多元文化,异质文化交织,但是,它们都不是行政机构多元、司法系统多元、交通系统多元、货币多元,在异质性程度方面,都远远不能与近代上海相比。

这还表现在它的不可复制性。道理很简单,那么多的多元的存在,是以中国政府丧失对租界的行政管辖权、司法权、教育权等为前提的,是以不平等条约为后盾的,任何一个独立国家都不会以丧失对一部分主权来进行这种复制。

这种不可复制性还在于,它的形成过程也不可复制。租界作为“国中之国”,并不是某个人、某个国家主观设计出来的,具有不可逆料性。治外法权是租界产生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西方列强在中国共设有 26 个租界,在许多城市享有治外法权,但没有哪个租界、哪个城市出现像上海这样复杂的情况。如果没有小刀会起义、没有道台权力失控、没有华洋混处,上海租界的形态就不会是后来人

们所熟知的那个样子,而小刀会起义、道台权力失控、华洋混处局面出现,都是彼时彼地、国际与国内、中央与地方、内政与外交、政府与人民、现实与历史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交互作用的结果。

内蕴如此丰富、情况如此复杂的城市,正是研究社会生活史的极好对象。

研究上海城市社会生活,从多时段、多角度、多侧面切入比较理想。为此,本书在卷目设计方面,既有以空间为维度展开的,如关于公共活动场所(茶馆、饭店、旅社、浴室、广场、菜场)、公共娱乐场所(公园、影剧院、书场、游乐场、跑马厅、跑狗场、赌场)和校园生活的研究;也有以职业、阶层为维度展开的,如关于买办、医生、报人、律师、科学技术工作者、舞女生活的研究;还有以国别、民族为维度展开的,如关于英美人、法国人、日本人、俄国人、犹太人、印度人的研究。各卷关注点以广义的社会生活为主,包括人们的居住、饮食、衣饰、交通、娱乐、交往、婚姻、家庭、风俗、习惯、工作环境、工作特点、收入、消费等方面,兼及其政治态度、精神生活。

本书以研究近代上海为主,兼及古代、当代上海。上海城市生活,从时间上看,明显地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843年开埠以前,那时的上海是中国普通沿海城市,与宁波等一般沿海城市相比,没有太多特别之处。第二阶段,为1843年至1949年5月,即通常称为近代的时期。第三阶段,1949年5月至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第四阶段,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古代上海是近代上海变迁的基础,当代上海是近代上海的延伸。1949年以后的上海城市生活,其变迁起伏,与整个中国城市生活变迁起伏的曲线基本一致,影响城市生活变迁的函数,时代因素重于区域因素,但是,上海仍然有其自身特点,有其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精神。

这是本丛书将古代、近代、当代连通起来进行研究的原因。

历史研究需要关注宏大叙事,也需要关注日常生活。如果能够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在关注宏大叙事时兼及日常生活,在关注日常生活背后有宏大叙事意义,更为理想。本丛书汇集这么多学者集中研究上海城市生活,除了上面所述的学术因素,即上海城市生活的极端复杂性强烈地刺激了我们的研究兴趣,我们还有一个奢望,就是通过这项研究的展开,试图探究一下彼此悬殊的异质文化,在相对平静的状态下,是如何相遇、共处、交流、融合的。这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是一个全人类已经面临、无数学者正在关注的重大问题。

这是因为,历史行进到信息时代,波音飞机、高速列车,极大地提升了人类个体流动的速度,手机、因特网,极大地加快了人类信息传播的速度,古人所臆想的千里眼、顺风耳、飞毛腿都已成为现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员交流、信息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便捷;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之间的理解、尊重、共存,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重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在全世界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与其说是源于人们对文明冲突的担忧,还不如说是源于人们对文明对话、文明和谐的冀盼。历史是现实的老师,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总爱向历史请教,从历史中汲取养分。于是,异质文化解读史、异质文化交流史受到学界的空前重视。在这方面,近代上海是难得的个案。

以近代上海与今之世界相比,同构、相似之处极多。近代上海实为一小世界,今之世界实为一大上海。

本书总的框架、卷目由我设计,各卷内容则由作者独立完成,我既不参与其章节设计,也不负统稿之责。

本书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各卷作者多为上海

社会科学专业研究人员,来自历史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宗教研究所、欧亚研究所,也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东华大学与上海档案馆的学者。多年来,课题组多次举行国际、国内各种类型的研讨会,对所研究对象以及中间成果进行交流、讨论,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本书是课题组成员多年来集体攻关的智慧结晶。值此项目完成之际,作为项目负责人,我谨向各位课题组成员,以及他们所在的单位,表示诚挚的谢意!

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7年12月24日

注 释

- [1] 石海山等著,朱荣发译:《挪威人在上海 150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年,第70页。

序 言

苏智良

民国上海，曾经有过一段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存续至今的许多街区名楼、花园洋房，乃至百货公司、名牌产品，多出自那个时期。“黄金时期”通常指 1927—1937 年间，令人扼腕的是，随着 1937 年日本侵略上海的“八一三”炮火的轰鸣，上海城市近代化也遭受严重挫折。

民国时期，是一个革命与战争激荡的年代，尤其在上海，各种政治势力纷纷登台亮相，鼓吹呐喊，以影响未来中国的命运。知识分子群体或信仰马克思主义，或崇尚自由主义，为实现各自的改造社会的理想而展开有声有色的活动；曾将中央设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则宣传主张，鼓动工人运动，参与抗日救亡，十分活跃，尤其是在 1927 年到 1931 年的特科时代……在种种政治势力中，财势膨胀的商界、市政府和市党部之间的较量与合作，呈现出更加繁杂的政治景象。

居全国首屈一指地位的上海资本家阶层，有着参与地方政治、地方自治的悠久传统。地方自治运动的开展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强化了他们的市民身份意识，使得他们逐渐培育起对社会的责任感，把个人命运与整个城市的命运结合起来。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们继续参加上海特别市参事会、建设讨论委员会、上海临时

市议会等组织,企图实现“市民自治”的理想;他们既与国民政府坦诚合作,又不满足于政府对咄咄逼人的日本的妥协和丢失东北。在“一·二八”战争政府缺位的特殊环境里,上海工商界调动起各种社会资源,维持上海社会的正常运转。在淞沪战后的重建中,工商界又通过参与地方治理,使得地方自治精神得以延续,并谋求更多的权益和活动空间,这自然会遭到来自上海市政府和市党部的双重打压。

上海市政府希望自己是强势的,所以对上海社会加强控制,但这并不意味着窒息了工商界参与上海地方治理的空间。1927年后的上海,社会与政府的合作得以继承,市政府吸纳工商界主要人士就行政事务向他们咨询,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工商各界的吁求。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主义运动的冲击下,市政府、市党部发生的权威危机,则直接导致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地方社会控制的松懈,这就为工商界参与地方治理提供机会和比较宽裕的空间。淞沪战后,南京政府和上海市政府需要重建自己的权威,但却面临着政治和财政的双重限制,而且政府不能无视工商界在战时所作出的贡献,因此,政府不得不吸收上海工商界人士参加上海地方议事机构,给予工商界的民间事业以合法性支持,以延续双方的合作。但是,工商界和市政府的合作是有限的。随着中央集权的完成和政府着力权威重建,政府对工商界的活动又转为压制为主。

在上海的国民党市党部,曾云集着一批年轻气盛、想做点事情的激进青年人,他们在1927年清党运动中势力急剧膨胀,秉持着“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的理念,极力扩张党权。尽管党部与政府有许多一致的方面,但也存在分歧与较量,为争夺权力资源,他们之间时常起冲突。上海市党部对地方行政进行强硬干预,屡屡干涉地方行政。不仅如此,还以“提高党权、巩固党权”为名,加强对上海民众运动的领导权,它是取消商会提案的提出者和坚定执行者。但是,国

民党中央地方党政分治原则的推行,以及经济上的不自主,使得市党部“以党驭政”的愿望越来越渺茫,事实上,1931年后,市党部的活动也越来越局限于党务方面。从市党部与工商界的关系分析,出现了角色定位的冲突。市党部把自己看作是“以党治国”政策的执行者,而工商界追求的是实业的发展和经济利益的实现,他们渴望的是一个稳定的自由发展经济的环境,而党治则意味着把一切纳入党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进入经济领域,则意味着国民党可以运用军事、政治、思想等超经济手段全面地干预经济活动,扼制资产阶级势力,从而引发与商界矛盾的激化,这可以说是工商界和市党部频起纷争和冲突的根本原因所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全民族抗战已成大势,由上海市地方协会、市商会、市农会等500余团体组成的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正式成立,这表明在国难当头的背景下,市政府、市党部、工商界再次走到一起,结成统一的抗日联盟。

对上海政商之间的互动,学界过去少有人研究。白华山博士的这本著作,从国家与社会的分析视角,借鉴政治学、社会学和计量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把地方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放置在上海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对1927—1937年间工商界、市政府与市党部三者关系的演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作者指出,政治权威的变化是理解工商界和市政府、市党部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还提出了一个命题,即政党、政府和工商界,如何界定好自己的角色身份,如何协调好彼此之间的关系,是近代上海社会变迁中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白华山君于1997年进入上海师范大学,攻读中国近现代史硕士学位。3年期间,与我朝夕相处,切磋学术,度过许多难忘的时光。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市地方协会研究(1932—

1937)》曾获得上海市研究生优秀论文奖。此后考入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学者戴鞍钢教授,视野更加开阔,学术实力有很大的长进。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新人辈出,新作迭现,年轻的博士们起点颇高,超过近代以来任何一代史家。但史学研究是件辛苦、寂寞且需要长久坐冷板凳的苦差事,能够长期保持学术创新能力和成果的人,并不是很多。期待白华山君勤奋钻研,形成旺盛、持久的研究力而卓然成家。

2007年5月1日于沪上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从上海市党部改组到上海总商会改组	11
第一节 在清党运动的风雨中	11
第二节 上海特别市参事会	23
第三节 张定璠任内的市政府与市党部	36
第四节 党治与上海总商会的改组	43
第二章 工商界、市党部与张群市政府	68
第一节 从建设讨论委员会到财政讨论委员会	68
第二节 工商界与上海市政府的税收改革	74
第三节 保卫团整理事件	88
第四节 市党部与张群市政府	98
第三章 民族主义的高涨与市政府、市党部的危机	116
第一节 抵制日货运动的制度化与异化	116
第二节 市政府、市党部的危机及其反响	131
第四章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官商合作	154